

# 美国率先加息：全球通胀治本之始

◎章玉贵

在全球性的通胀使得世界各国的央行面临10年来最棘手挑战的关键时刻,作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美国,若能率先加息,不仅是全球协调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之举,亦成为衡量美国是否真正承担国际责任的一根标尺。

毋庸置疑,通货膨胀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危机,尤其被认为是潜在力量中心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遭遇了更严重的通胀,一些国家经济几近失控。倘若没有全局性的对策,则极有可能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细究此轮通胀,显性的原因在于上一轮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价格,以及消费升级、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导致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根源则是美国经济失衡下,美元贬值以及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降息、注入流动性,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而引致的连锁反应。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在检视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前瞻性的经济决策,真正使自己的货币政策服务于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从世界经济的平衡性来看,应该是美国而非发展中国家提高利率。如果美国因为担心在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价格尚未稳定之前,加息将使经济面临进一步的衰退,不想承担治理全球性通胀的责任,则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将更为严重,最终将导致更高的治理成本。因此,美国亟需推出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并着手规范投资银行。

采取抑制通胀,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但同时有利于降低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基于这种溢出效应的考量,各国央行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如加息),都希望其他国家不要过度压缩需求,都将降低低通胀的外币需求拉动动力,都希望某个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在国内保持低利率的投资拉动状态,同时将该国的汇率迅速升值,因为这意味着该国可以分担调整国内外的通胀成本。发达国家普遍希望由中国来扮演这个角色。值得称道的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美联储多次紧急降息以维系经济增长的情势下,欧洲央行出于遏制通货膨胀的考虑没有降息。而加拿大、英国等则跟随美国降息,通胀水平应声抬高,扮演了不负责任的角色。而中国较为负责的货币政策已经令本国承受了巨大压力。即便如此,美国也不要指望身子

背还硬的中国通过“硬扛”的方式来承担国际调整的成本。

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美国消费增长以及中国投资的激增与低成本带来的低通胀。而当前的全球通胀问题并非单一的国家可以改善,需要全球各国积极配合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但是,从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影响来看,美国应该率先承担起治理全球通胀的责任,而不能一直仰仗美元霸权获取的低成本收益。诚然,美国加息可能恶化美国的经济,但这是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大部分都是海外输入的。即便他们提高国内利率也不会对粮食或石油的国际价格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从世界经济的平衡性来看,应该是美国而非发展中国家提高利率。

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央行货币政策

“彼此算计”,已经让我们错过了治理通胀的最佳时机。如果美国因为担心在房地产市场和住房价格尚未稳定之前,加息将使经济面临进一步的衰退,不想承担治理全球性通胀的责任,则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将更为严重,最终将导致更高的治理成本。因此,美国亟需推出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并着手规范投资银行。当然,我们看到,伯南克已经承认弱势美元引发的通胀风险,美元超跌反弹概率增大。美国有可能在年底或者明年进入加息周期。但在全球通胀面临失控的危急时刻,世界各国最希望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加息预期,而是切实的行动!尽管我们都知道,抑制这一轮全球性高通胀不能只靠货币政策,但美联储的率先加息无疑将是全球通胀治本之始!(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临时价格管制是必要的

◎魏也

日前,山东省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省内煤矿增加供应,不得随意涨价,七八九三个月,所供电煤在6月价格基础上每吨下调10元。这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放开煤价以来首次对市场价进行干预,也是继2008年1月中旬,发改委和十几个省市地方出台价格管制政策以来,又一引人注目的举措。由于其他诸多省市也面临着与山东同样的问题,对煤价的管制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省市效法。

价格管制一直备受质疑。一些经济学家明确指出,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甚至经常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限制竞争、扼杀市场活力等。结论是:价格管制对于通货膨胀起着加剧和延长作用。

有关价格管制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的观点,可能存在一定争议,而对价格管制延缓通货膨胀的作用,则被许多人所认可。适当的价格管制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抑制通货膨胀,将可能爆发的恶性通胀转化成受抑制的通货膨胀(隐藏的通货膨胀),也即,由于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与配给制,通货膨胀在一定时期内并没有发生。关键在于一旦解除价格管制后的情形,通胀是否能够继续得到控制。

目前,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价格管制是必要的。尽管价格管制不能消除通胀压力,而只能延缓,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价格管制换取平抑物价、减弱通胀压力的时间也算得上是次优选择。实际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今年1月至4月,我国CPI同比涨幅分别为7.1%、8.7%、8.3%和8.5%,一直在高位运行,倘若油价、电价等放开,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范围内的物价上涨,从而引发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通胀预期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又会反过来加大通胀压力,从而为恶性通胀的形成带来可乘之机。这是需要警惕的。

当然,价格管制的时间不宜过长,相关价格最终还需要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而在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通过价格管制延缓通胀力量的释放,争取一个将相关商品的价格交给市场调节的最佳时机,其实也更有利于舒缓通胀压力,对民众的心理影响尤为如此。

我们知道,去年我国CPI在4月份同比上涨3%,5月同比上涨3.4%,6月同比上涨4.4%,7月同比上涨5.6%,8月同比上涨6.5%……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相应的,今年的CPI同比涨幅,也会在5月份之后,逐步减弱,然后,再逐步放松价格管制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将能实现电价、油价等商品价格的平稳过渡。否则,在通胀压力本来就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时机选择,一味照搬经济学教材,直接取消价格管制,将所有商品的价格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事实上,通胀本身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失灵的结果,这个时候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而需要行政力量的适当干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适度的价格管制可能更有必要,那就是国际投机因素。最近几年,由于美元贬值,国际热钱涌向大宗商品领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油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突破每桶135美元。如果我们的油价不受任何价格管制,完全随着国际油价起伏,就使得国内油价听命于国际炒家的指挥棒涨跌,这不仅会增强投机资金的炒作欲望,也使得我国油价因为丧失一个基本的平衡点而陷入暴涨暴跌中,从而,威胁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引来更多的投机者——当然,也包括国内的投机者。

## 行政事业性收费应逐步走向终结

◎吕青

6月4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次取消和停止征收的14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30个政府部门,近20亿元人民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表示,上海要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

众所周知,名目繁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既是乱收费的载体,也是腐败的寄生体。因为,伴随着合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滋生出了庞大的乱收费项目。尽管法律要求,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基本上被架空。

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很难对某项收费的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更多的时候是盲从或无奈地顺从。甚至,就连那些已经失去合法基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在许多地方还一直堂而皇之的存在,成为中小企业尤其创业者的沉重负担。以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为例,除了这次宣布取消这项收费的上海,还包括四川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其他很多省市则仍在继续收取。而实际上,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早已失去存在的法律基础并被明令取消。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关于治理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明确规定: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实行统一政策,取消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罚款项目和各种摊派等歧视性收费规定。”



漫画 刘道伟

与税收相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收标准缺乏透明度与严格的规范,从而,成为一些部门敛财的工具。如:超越权限,擅自审批或自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转移行政职能,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利用职权,强行服务,强买强卖,把权力商品化;凭借垄断地位,在经营业务中乱收费、乱提价等乱象。

并且,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借助行政事业性收费不透明、不规范的机会,吃、拿、卡、要或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严重影响了行政事业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嫁接在行政事业性收费身上的各种乱收费,成为创业者的头号杀手,严重抑制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约65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2006年《经营经济蓝皮书》显示,过去5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由2571万户下降至2464万户,减少了107万户,

年均降幅为0.8%。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成本过高:三分之一的税,三分之二的费,费大于税,使得创业艰难。

应该认识到,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已占全国总量的60%和40%,中小企业还占了出口总额的60%,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在目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通过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创业者的负担,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机会,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行政事业性单位作为服务机构,已经享有纳税人通过纳税提供的活动经费,它应当为纳税人提供服务而不是对相关服务标价出售,这不仅降低了职能部门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也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并且,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服务理念。因此,行政事业性收费应该逐步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越少,借助合法收费衍生出来的乱收费越少,官员越容易廉洁,效率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事业性收费应逐步走向终结。

## “限塑令”背后的沉重话题

◎郭凤霞

一纸“限塑令”,不仅意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全体国人的公民素质和环保意识。这项政策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能持续多久,现在还不好加评论,但各大超市卖场塑料袋一天的使用量,迅速剧减3/4,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记得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将从今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消息时,曾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高度评价者有之,好奇者亦有之。有报道称这一行动非常“大胆”,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中国却走在了世界前列。加拿大多伦多市长苗大为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式”的禁令不会发生在多伦多,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那样做。但有趣的是,中国在环境保护上居然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毋庸置疑,塑料袋以其方便、清洁和牢固,作为购物工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由于价格低廉,免费赠送,出现了普遍使用的现象。最直观的,我们在菜市场买菜,一把青菜一个塑料袋,甚至几根葱一块姜都会给一个。按一个蔬菜摊一天送出100只塑料袋来计算,200个摊位的一个中型菜市场一天之内就可送出20000只以上,一个月60万只,一年则可高达730万只,而全国有多少万个菜市场都在这么做着。我们知道,塑料是人工合成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要200年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可降解的塑料研制到现在,还远远不具备推广价值。如果采用焚烧的办法,就会产生大量严重侵害人体健康的二恶英等有毒气体。据了解,目前1000吨城市垃圾中,就有6吨塑料垃圾。这样下去,地球总有一天会被塑料袋所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塑令”就是对“白色污染”的一种宣战!

如果追溯到源头,塑料袋普遍滥用的背后更是一种对石油资源的浪费。按照中国消费者

每年使用30亿个塑料袋来计算,大致要用1300万吨石油。“限塑令”出台的另一个背景应该和国际石油价格高企不无关系。从2006年3月起,石油价格从每桶60美元开始走高,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从今年5月22日,已经飙升至每桶135美元。根据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大通的预测,国际石油价格将长期走高,不排除年内突破150美元,2010年达到200美元的可能。尽管我国是世界产油大国,石油产量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五,但石油消费量的增长远远大于产量的增加。随着我国国内对原油进口的需求量持续上升,高油价也直接导致支付原油国内成本的上升。而这高昂的成本,最终还须由国内以石油为能源或原材料的相关各行各业来承担,从而降低行业利润,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再说的远一点,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到底能开采多久,能供人类使用多少年呢?任何一种资源都会有耗竭殆尽的时候,因而节约使用能源绝对不应该是空话。

最近几天,“限塑令”正在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有人认为自正式实施以来,效果出人意料的好,“限塑令”正在化为很多人的自觉行动,说明国人的环保意识大大觉醒;也有人认为,或许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妙,不要变成另一场秀,再重演一次性筷子的故事。笔者以为,“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购物工具出现以前,塑料袋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通过“限塑令”,像以前那样普遍滥用的情况一定会大大得到改观。

一只不起眼的塑料袋,牵扯到的话题却尽是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利用这样沉重而又宏大的话题。事实上,从纸袋、布袋到塑料袋,每种购物工具的变化都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演化,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以消费资源为代价的,当我们消费不起的时候,改变这种方式就成了必然。

## 怎样解释政策目标与效果的“漂移”

市场规律一旦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所认识,便转化为主观而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进而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这种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因此,研判政策效果,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其的反作用。

◎李国旺

周洛华先生在本周一的专栏中说:“每当我们揭示了市场的某些规律之后,市场立即用暴跌和危机的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运行方式,使我们每一次试图预测市场走势的努力都化作徒劳。”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要解释这类社会经济运动中类似的“异象”,就得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看看主观的认知力量在成为“客观事实”后对原来的“市场规律”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解释当今各种金融之迷。

市场是各种利益主体利益交换和

分配的平台,也即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主要平台;在价值实现和分配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不是平等的,利益分配总是倾向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一旦这种不均衡分配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自组织力量就会向相反方向运动,以纠正组织力量对市场的有机体的损害,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益主体间总是会出现“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现象。这两种力量在经济运行过程的不同时段里总是不断交替着,因此反应于外,就是主流声音在不同时段出现强调效率或强调公平的不同主题,或者有时讲稳定,有时强调发展。

在社会经济领域,一旦在一定时间内市场运行“规律”为群体掌握,群体一“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异化”力量,即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主观的认识成为一种“客观”的市场力量后,就会进一步形成“社会自然力”。考察各项为使市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效运行的调控政策,就会发现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漂移”。今天,这种漂移已成为宏观政策效果不彰之谜,也成为政策导向与实际效果争论的源头。如果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分析,对政策效果漂移现象就会有合理的解释:市场发展规律一旦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所认识,便转化为主观而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进而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主观政策—客观规律”间共同产生出一组意料之外的扰动结果,这种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

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当然是在中华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中国,毫无疑问会带上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烙印。伴

着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情结的,便有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等非理性现象。投资者群体对资本市场的政策调控往往又爱又恨。市场不景气时,期望具有父爱精神的政策出现;市场牛市时,就强烈反对政策干预。著名的“印花税”政策,就因为投资者特有的群体性情绪而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现象。2007年5·30“提高印花税率,目标是让市场适度降温,以求平稳增长。但投资者群体在惊恐之余,发现还可以利用限售股要到2007年底才可大规模减持的股改政策空间,大批散户便以认购基金形式避免印花税率上升的冲击,抑制性的印花税政策因此漂移了近半年才收到效果。同样,当市场出现过度恐慌、非理性的恐惧行为导致了市场过度下跌时,印花税率再度调整,回归原有水平,但投资者群体对解禁股的顾虑抵消了印花税率调整的效果,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

如果说金融市场的复杂有如天体运行,则“金融天体”运行之轨迹虽然已为

西方金融学界数量化进而线性化地“掌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谜”。事实上,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即便如天体般可以精确测算,一旦介入投资者群体,则这一天体“轨迹”就会漂移。在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中,也有如量子力学般“测不准”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认知—规律(天体)”以及“客观天体”—“主观天体”之间多重规律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层次功能,这些功能反作用于市场,致使市场原来的模型预测的结果出现“漂移”。如果投资管理者在杠杆和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动态平衡的话,如果杠杆和流动性同时失控,如果市场群体的主体认知此时仍在过度利用“模型”进行杠杆操作,则必然造成致命的打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灭亡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要金融市场中快乐地幸福地进行,我们不仅要寻找客观存在的各种变量(谜或理),还得寻找这种变量共同作用后群体主观认识产生的主观观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各

种变量产生作用和结果后,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其反作用,以及这种反作用反过来作用于市场产生的“次生结果”和“再生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研究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忽略对于这种结果引发的群体认知产生的主观作用和主观作用反作用于各种市场变量的结果,那就只会发现第一步的线性结果而无法发现第二和第三步次生和再生的结果。

圣人本无心,以百姓(群体)之心为心”,只要我们把握住各种利益主体对不同利益的追求之心,就会发现原有市场变量交互作用后产生的新变量的规律,以及各层次规律与各种结果之间的新一轮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能够这样,面对“四面八方”各种主客观力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各种结果,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方法论,我们就有可能破现代金融学之“谜”,最终有效防止各种金融现象积累下因主要效果及次生效应的冲击而产生的主要风险、次生风险及再生风险。